



交际语言译丛

行为互动

——小范围相遇中的行为模式

亚当·肯顿 著
张 凯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为互动:小范围相遇中的行为模式/亚当·肯顿
著;张凯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摇(交际语言译丛)
摇ISBN 7-80149-471-7

摇I. 行…摇II. ①亚…②张…摇III. 人间交往-行为科学-研究摇IV. C912.1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1666号

· 交际语言译丛 ·

行为互动

——小范围相遇中的行为模式

著译者: 亚当·肯顿

译译者: 张凯

责任编辑: 罗琳

责任校对: 同文

责任印制: 同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摇电话 65139963摇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摇1/32开

印张: 12

字数: 275千字

版次: 2001年2月第1版摇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149-471-7/B·083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摇翻印必究



目摇摇录

| | |
|---------------------------|-----|
| 前摇摇言····· | 1 |
| 1摇摇绪摇摇论····· | 1 |
| 2摇摇语境分析的来龙去脉：面对面互动结构 | |
| 研究的起源····· | 15 |
| 3摇摇两人交谈时注视方向的若干功能····· | 54 |
| 4摇摇社会互动中的动作协调：若干例证····· | 96 |
| 5摇摇接吻过程中的面部功能····· | 124 |
| 6摇摇人类某些问候方式的描写····· | 162 |
| 7摇摇社会相遇的空间结构：F—组合系统····· | 221 |
| 8摇摇面对面互动中框架调节过程的行为基础····· | 254 |



| | |
|--------------------|-----|
| 引用影片目录····· | 280 |
| 参考文献····· | 282 |
| 人名索引（按汉语拼音音序）····· | 323 |
| 人名索引（按英文字母排序）····· | 334 |
| 术语索引（按汉语拼音音序）····· | 345 |
| 术语索引（按英文字母排序）····· | 355 |





前摇摇言

厄尔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1967, pp. 1 ~ 3) 曾号召对交往的“基本行为材料”进行研究, 本书中重印的这几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这一号召的响应。这些文章较详细地讨论了他所谓的互动中的“微小举止”, 亦即“眼神、姿势、站位及言谈”等构成面对面相遇的材料。戈夫曼相信, 这项研究既会使描写“互动的自然单位”成为可能, 也会使认识“这些单位内及单位间的一般规律”成为可能。他论证说, 为了了解人们在与他人互动时是如何墨守成规的, “我们需要找出无数的行为模式及其自然顺序, 当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面前时, 这样的行为就发生了。”这里再次发表的五篇文章(第3~7章)正是在这方面的尝试。

在贯穿于这些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 我不仅受惠于厄尔文·戈夫曼, 而且, 我也要感谢戈里高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雷依·伯德惠斯戴尔 (Ray Birdwhistell) 和阿尔伯特·舍夫兰 (Albert Scheflen)。贝特森、伯德惠斯戴尔和舍夫兰展示了“博物学 (natural history)”方法对互动研究的价值, 而且他们表明, 根据对互动材料的细致考察可以推导出什么东西, 如这些材料可以从电影或录像带中收集。这里重印的五项研究全部遵循



这一方法，该方法有时称为“语境分析（Context Analysis）。”在第二章，我讨论了这种方法的几个来源以及它们是怎样结合成这一研究方法的。我讨论了语境分析在社会互动研究中的地位，它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般方法，同时我也表明，在这个方法的发展过程中，诸如人际精神病学（interpersonal psychiatry）、信息论、控制论、结构（描写）语言学这样一些相距甚远的学科产生了什么性质的影响。

通过语境分析我们有所发现，最后，第八章对这些发现所蕴含的东西做了一些思考，并且试图为建立“框架”的理论工作提供某种行为基础，这个“框架”先由贝特森提出，后由戈夫曼发展。对于一个关于小范围互动（focused interaction）的参与者如何组织和协调各自注意力的理论，该框架是一个贡献。

第3~8章的首次印行是在1967~1985年间，在脚注中，我将分别向最初的出版者一一致谢。其中的五篇（第3~7章）也曾以《社会互动中的行为探究》（*Studies in the Behavior of Social Interaction*）为题结集发表，该书1977年由彼得·德·里德（the Peter De Ridder）出版社和印第安纳大学的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中心出版。我重写了第五章的一小部分，因为这部分已完全过时，除第五章外，这里重印的其余文章均未做改动。当然，在适当的地方，我加上了一个简短的后记，说明自该文问世以来，又有哪些与此有关的著作发表出来。绪论（第1章）是1977年文集绪论的修订版。第2章虽然根据的是早先发表的一篇文章（肯顿1982），但却是特别为本书而写的，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新材料。弗里德里克·艾利克森（Frederick Erickson）读了新写的这两章的手稿，并提出了详细入微的建议，我尽可能接受了这些建议，这些建议使文章大为增色。



在1977年的文集中，我曾特别向阿尔伯特·舍夫兰致谢。因能够在他身边工作达几年之久，我自认为特别幸运。在理性思考和事物处理两方面，第4~7章的工作都受到了他直接的督促。我要再一次重申我对安德鲁·福波尔（Andrew Ferber）的感激之情，因他在第6章所述工作中的合作，还因他允许我自由地使用这项研究及其所依据的材料。罗伯特·麦克米兰（Robert McMillan）和罗伯特·迪希（Robert Deutsch）对第7章的工作有重要贡献。与马修·西奥雷（Matthew Ciolek）的讨论对这一章也是很重要的，他还帮我制作了里面的插图。威廉·康顿（William Condon）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工作和方法。第4章就是我和他一起工作的直接成果。在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亨利·布劳森（Henry Brosin）博士是西宾夕法尼亚精神病研究所的主任，我至今仍十分感激他促使我留在那个研究所的好意。在牛津，是E. R. W. F. 克劳斯曼（Crosman）博士最早建议我研究社会互动方面的影片。在影片分析方面我所做的最初尝试是与奈梅亨（Nijmegen）^①的J. 爱克斯（Ex）教授合作进行的。我仍然记得我们的那些讨论是多么有价值。迈克尔·阿盖尔对我的工作的兴趣经年不衰，并且一直在鼓励我，他始终是一位益友。

最后，我要感谢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z）教授，他建议本文集应该列入他的“互动社会语言学丛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Series*）再次出版。

^① 荷兰东部城市，与法国邻近。——译者注



总摇摇序

《交际语言译丛》介绍的是实际社会语言学领域有影响的著作。交际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是西方语言学界在 70 ~ 80 年代兴起的一个语言学流派。其特点是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虽然交际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它实际上是一门交叉学科，跟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关系非常密切。

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交际社会语言学，它的兴起需要有一个成熟的社会语言学作为前提。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则是对结构语言学的反动。西方现代语言学起始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语言的系统性的观点，认为语言的符号只有在系统中、在和其他的符号对立中才有意义。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发现对立统一的系统，确定什么样的初始要素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初始要素是没有对立意义的。索绪尔的理论中有许多重要观点，最著名的是关于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的区分。言语指具体的语言运用，即一次次内容形式不尽相同的具体讲话。语言指的是一个潜在的系统，该系统能反映出多变的言语活动背后的稳定的规律。这个观念有它的积极意义：它可以激励语言学家从仿



从复杂的语言现象背后找到系统的规律，从而脱离传统语言学局限于经典考据的羁绊，使语言研究上升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这个观念的负面影响是，它促使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跟具体的社会交际以及具体的语言环境相脱节。这种思路到了后来在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与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把它推向了极端。乔姆斯基明确提出，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理想社区中的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可是，由于理想的状态和理想的语言说者是不可能得到的，语言学家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语感，语言学的研究也就成了对个人语感的研究。在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中，一对比较重要的概念是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前者指的是看得见、听得着的外在语言形式，后者指的是是一些抽象的范畴。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即转换生成的过程——成了语法学家的一个主要任务。这样一来，语法理论所关注的就离语言的实际运用越来越远了。

正如甘柏兹所说，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极端结构语言学的实践假设了（1）人类言语行为可以用一个语法系统的集合来描写。（2）语言在人类实际活动中的作用不过是传达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以及语词组合时的语法关系。（3）对语言的理解是从语音开始，逐步上升到单词、短语、句子等较大单位。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这些假设没有一个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假定每个社区只有一种语言系统是过于天真了；事实上，双语或多语才是更普遍的现象。以拉波夫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家通过对实际语言的调查，发现了大量的语言变异现象。变异现象不仅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网络有关，也和使用者所处的交际环境有关。这些发现说明，脱离社会现实的语言研究即使不是带误导性的也是非常片面的。从言语交际的过程来看，人们在交际的时候所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是在



不同的层次上同时进行的。

早期的社会语言学偏重于变异、变项和变体的研究，也就是低层次语言单位的研究，并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上解释变异现象。随着研究的进步，有一批社会语言学家把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连续的谈话和篇章方面。这跟功能语言学派中的话语分析学派的发展是平行的。他们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利用什么手段组织话语（说话人的角度）和理解话语（听话人的角度）；如果交际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是缘何而起的。这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就被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社会语言学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的共同基础是主张把语言放置到大的社会环境下进行考察，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团的语言实践：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影响语言的发展。交际社会语言学的最重要发现是，会话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罗列语词的过程。人们在会话过程中既要利用语法词汇的知识，也要了解语义框架和解读话语的线索，包括各种各样的语用知识。研究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在会话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说话人的社会文化背景如何跟这些知识相互影响就成了交际社会语言学最主要的任务。

交际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一般上认为跟高夫曼（Goffman）以及布朗（Brown）、列文森（Levinson）等人对所谓礼貌现象（politeness phenomena）所作的论述有很大关系。高夫曼曾经指出，谈话人在交谈时需要满足两种面子要求——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所谓积极面子就是在交流时参与者要表现出跟别人十分融洽（show involvement with others），而消极面子指的是不要得罪谈话对象。罗宾·雷可夫（Robin Lakoff）也指出，语言形式的选择常常遵循着一种和睦原则（Rule of Rapport），这种原则可以解释谈话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人们经常因为出于为对方考虑而不直接



说出他们要说的意思。布朗和列文森（1987）进一步把这些问题总结为普遍礼貌原则（Universals of Politeness），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交际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人物之一是甘柏兹（John Gumperz）。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是谈话的指示线索（Contextualization Cues）。甘柏兹的这个概念跟海姆斯的“格调”（Key）的说法有相似之处，它们共同来源于白森（Bateson 1972）的框架（Framing）的说法。白森认为，没有一个语句的含义可以离开一个合适的框架而得到解释。例如，任何一个正常的语句都可以作几种完全相反的理解。一个本来是严肃的命题，只要说话人把这个意思用开玩笑或讽刺之类的口气说出来，这句话就有可能被理解成完全相反的意思。讽刺、开玩笑和严肃的陈述就是不同的话语框架，相应的语气就是指示这些框架的语言线索。在文献中，有的学者还把类似框架这样的概念追溯到哲学家皮尔士（Peirce）关于符号的引得属性（Indexicality of Sign）的理论。框架在词汇语义学和交际社会语言学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在交际社会语言学中，实际交际中语言的表达的性质也被解释成谈话人之间的话语框架交换的过程。

把不同的言语成分看作是谈话的指示线索，这里有一个关于什么是语言的假设。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的一些特征被看作是语言的核心特征，另外一些则是边缘特征。他所谓的核心特征是能够区别所指意义的特征，包括音段音位、词缀、句法范畴等。而像语调、话语节奏特征都被看作是无关宏旨的边缘性特征。而交际社会语言学认为，结构语言学家对语言信号的理解过于狭窄了，这些所谓的边缘特征往往是构成交际信号系统的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具有实实在在的交际意义。语言研究的



重研究同一个种族内部的交际差异，例如同一种族内男女性别的差异对交际策略的影响，而跨文化的交际研究常常涉及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交流。不过交际社会语言学没有必要，事实上也并不排斥涉及不同种族和民族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本丛书系列之一的斯考伦夫妇所著《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一书实际上对以上两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另外一个对交际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有影响的学派是社会学中的会话分析学派。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CA）不是指任何对会话的研究，而是一个专门的学派（在英文文献中常用大写的 CA 代替）。这个学派把交谈看作是一种有强烈结构规律可循的社会活动，会话分析对日常会话的结构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整套分析的概念和工具（例如话轮和话轮转移 [Turning taking]，谈话修复机制 [repair]，语对 [adjacency pairs]，话语评价 [assessments] 等），给交际社会语言学家提供了一套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例如目前美国最有名的交际社会语言学家谭楠（Tannen）就特别注意研究美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谈话时对话轮转移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人们对插话、沉默长度等现象的理解和容忍等。谭楠也特别强调谈话的协调性或节律性，认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人对谈话的节律是非常敏感的——何时接话，如何接话，可否重复别人的话，什么时候可以打断别人的话等等，正常的谈话人对此都有很清楚意识和期望。

本丛书首批入选作品三种，代表了交际社会语言学的三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其作者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家。其中甘柏兹的《会话策略》一书是交际社会语言学的经典之作。该书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委托甘柏兹主编的“交际社会语言学丛书”之第一种。内容涉及交际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和方法论。由于这本书是奠基之



作，后出作品没有不受其影响的。本书在 1982 年初版之后，在 1983，1984，1985，1987，1988，1989，1992，1994，1995，1998 年 10 次再版。

甘柏兹是交际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人。原为英国学者，后长期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目前为该校荣誉终身教授，并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参加教学活动，同时继续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交际社会语言学丛书”主编。甘柏兹早期的研究兴趣是双语和多语问题以及文化人类学，调查过北欧和南亚多语现象。后来研究重点转向伦敦和英国的社会语言学问题，进而转向交际社会语言学。

《行为互动》是剑桥“交际社会语言学丛书”的第七种。作者是亚当·肯顿（Adam Kendon）。肯顿出生在英国，曾在牛津大学学习生物学和试验心理学。肯顿是研究人类在自然（非试验状态）交际过程中非言语交际因素的先驱。作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著作，很多是这方面的经典。肯顿目前在美国费城地区从事独立研究。

《行为互动》一书收集了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发表过的五篇最著名的论文以及其他若干论文。每篇旧论文后面都有作者的后记，回顾该文发表后的最新进展。虽然书中所收文章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英语文化范围内（肯顿后来的研究涉及澳洲土著语言和意大利语），但该书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系统的方法论（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复杂的摄像及动作的转写技术）相信会对汉语的研究起到启发作用。

斯考伦夫妇所著《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代表了另外一种研究方向——跨文化的交际。作者有文化人类学的背景，其研究范围既包括人们所熟悉的大语言（英语、中文〔广东话〕等），除了在美国和亚洲（台湾、韩国）多所大学（包括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外，也曾给五



十多个政府及大企业的部门提供交际方面的咨询服务。

本书发挥了作者的专长，对跨文化交际的有关问题作了综合性的介绍。其重点是专业（商业、金融、法律等）领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具有突出的应用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另一个重点在于比较亚洲人和英美人在交际文化方面的不同，分析实例多取自香港、台湾和韩国。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论和亚洲文化的具体问题的有机结合。适用于亚洲专业人士和研究者。本书出版后得到国际间著名学者（如谭楠）的高度评价，认为“在这类研究题目上无出其右者”。

我国在交际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研究队伍还没有形成。这是我们把西方交际社会语言学引介到国内的一个主要动机。交际社会语言学紧扣社会文化问题研究语言，研究交际的过程和效果，这种研究有其先天的优势：它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也可能把语言学带入社会集体意识之中（谭楠的交际社会语言学论著曾经在美国创下语言学书籍高踞图书流行榜首的记录）。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抱怨语言学在社会上不受重视，作为语言学家我们也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走向社会而不是远离社会。加强交际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贯为推动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不遗余力，这次又在责任编辑罗琳等的推动下组织出版这套翻译丛书，令我们感佩。在编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原书作者的协助，对此我们也非常感谢。如果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交际社会语言学在我国的流布起到一点小小的推动作用的话，我们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陶红印

2000年8月2日于北京



1 摇绪摇摇论

互动，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些有序的事件。当两个人相互问候时，当几个人进行一场谈话时，当委员会开会处理它的事务时，当人们在街头偶遇时，不知不觉中，这些事情“成功”了，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事情往往是有秩序的。我们可能记得，在街上遇见熟人时我们要么感到愉悦，要么感到困扰；我们可以回忆起谈话中传达的内容的价值、委员会会议上处理完的事情，但是，这种回忆一般不包括如下细节：即那些事件是怎样构成的。我们一般不回忆事件的空间结构——如我们怎么知道何时轮到 we 发言，当我们发言时是如何组织词语的，以及别人这样做时他又是怎样表现的——否则，我们就弄不懂说的是什么了。然而，向人致意，进行一场谈话，街头与他人擦肩而过，都要求我们既要能识别既定的互动情景的性质，并据此接收和理解来自他人的信息，也要能在形体动作、朝向、话语等方面做出行动，行动一出，我们就离各自的目的更近了一步，而不是更加隔膜和迷惑，否则这个情景就没有社会可能性了。在这样的事件中，参与者一定要能“得体”地行事：例如在问候时，对于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我们很少犹豫不决；在街头与人相遇时，我们都不会停下脚步，因为我们对这样的假设很有信心：即他不会对